

长幼相辅：中国小城镇家庭的代际文化互动

——基于小城镇家庭群体观影行为的考察分析

孟君 李诚婧

摘要：小城镇家庭群体观影行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观影时的代际文化互动反映了小城镇家庭内部复杂的文化契合与情感交流，这是探究当代小城镇社会生活变迁的一个切入点。通过五地调研发现，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有稳定且清晰的画像，观影行为包括聚合型、扩大型和分散型等丰富样态。与此同时，小城镇家庭观影形成独特的文化互动机制：在特定的观影时空中，家庭成员通过意愿协商和权力让渡的方式完成观影互动过程，空间场域、情感关联与契约缔结则共同建构了观影互动仪式。

关键词：小城镇；家庭；群体观影行为；代际互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4-0037-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7BC040)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小城镇及其下辖乡、村的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情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代小城镇一方面承担着传统意义上“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与时空坐落的居民生活”^[1]的功能，另一方面，小城镇在现代化转型的迅猛进程中亦面临“水土不服”的潜在风险。对处于现代性与乡土性冲突之中的小城镇来说，家庭与个体在公共社会生活中的冲突与调和可成为洞察小城镇的显微镜。其中，小城镇家庭的娱乐消费与文化权力密切相关，不同代际的文化旨趣形成强烈的冲突与差异，这关涉家庭内部的代际文化传递以及个体权力让渡，由此产生文化权力的转移。

在国家加强小城镇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当代小城镇的生活方式与居民的文化审美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家庭代际间的文化互动关乎两代人或多代人的文化传承、伦理观念与审美取向，其中亦包含着文化权力关系的动态演变，这尤为体现在小城镇家庭的集体观影活动中。通过对五地的调研，笔者发现，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样态类型、行动目的及互动机制存在着多种显在特征，这种特定的代际文化互动成为探究当代小城镇社会生活变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二、问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一) 研究问题

小城镇是一个地域分类称谓。小城镇指“大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种社会聚落，包括小城市（主要指人口规模较小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建制镇（含县城所在的城关镇）和集镇（指未设镇建制但相对发达的小镇）三种类型”^[2]，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性社会聚落，也是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把小城镇定义为一个正在从乡村性社区变成多种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3]。同时，费孝通以浙江南浔镇的《少林寺》观影潮为例，说明娱乐生活在乡、镇、村社会居民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今

天,中国的小城镇已经发展为乡土与现代性质兼容,生产与娱乐功能兼备的生活空间。一方面,生产与生活空间的高度重合性令小城镇内部居民多围绕宗族和姻亲关系而形成交际圈,构成了保留着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循环性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小城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性的不同面向已然渗透小城镇社会。因此,乡土性和现代性是小城镇社会的一体两面。

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传统成为小城镇的独特社会习性,由血缘、亲缘和地缘形成的人际关系是勾连个人与小城镇社会的中介。在社会学视域,亲属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首属群体,家庭是亲属关系网络的特殊子系统。随着女性就业的普及和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过去庞大的家族体系精简至结构简单的小家庭,夫与妻、父与母、子与女是现代家庭关系的主要构成。在小城镇家庭这一新型社会结构中,亲属关系维系着家庭中的个体,为整个家庭提供抵抗流动变迁的稳定力量。在城镇化的现代语境中,文化消费成为小城镇家庭交往互动、建构关联的重要途径,观看电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尤其家庭观影是小城镇较为显著和普遍的文化行为。

小城镇家庭观影是指在小城镇内部及其周边下辖的乡、镇、村等区域,家庭成员结伴前往电影院、影剧院或流动放映点,共同参与集体观影活动的一种文化现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城乡文化事业基础建设,不断完善的国家电影流动放映体系孕育第一代具有集体观影经验的观众群体,同时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亦推动了录影带、数字电影、各类视频资源的普及,小城镇电影观众在不断成长和壮大。2018年,国家电影局提出要增加电影院银幕总数,使“电影院和银幕分布更加合理,与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分布更加匹配”^[4]。随着政策落地,全国小城镇迎来了影院建设的热潮,在原有基础上加设商用影院与商业综合体,培养新一代电影观众。相较而言,初代观众具有普遍性,观影具有强制性,新一代观众拥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周期性的观影习惯与独特的观影偏好。对小城镇家庭来说,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两代电影观众在家庭内部共存,文化行为的代际更替不仅反映了社会变化的影响,也体现了小城镇社会变迁对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由此,小城镇家庭群体的审美体验交互影响,代际之间形成复杂的文化契合与情感交流,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问题域。

(二) 研究现状

中国的“小城镇”研究始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社会学研究“大问题”。他认为,帕克所认为的亲密首属关系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完全具有适用性。随后他以小城镇为对象,分析中国乡村结构中的社会规范与家族制度,形成中国家庭社会学理论。此后,阎云翔及其团队以扎根下岬村为方法继续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归纳出中国社会转型期以来亲属关系的再发展,建构出新家庭主义理论。面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部分学者开始把目光投注于中国家庭的多重关系。Barbalet认为,家庭关系的决定性特征在于内部成员间无条件提供支持,亲密的亲属关系和开放的友谊关系则以拟亲属的形式进行过渡弥合^[5]。郭于华认为,“传统的亲缘关系作为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其形式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复制和放大”^[6]。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譬如贺雪峰认为,在当代农村社会出现了人情异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附着在传统中国血缘关系上的道德义务越来越弱”^[7]。近来项飙提出了“附近”概念,他强调家庭、社区等社会空间的重要性,并以婚育趋势与代际关系等精神文化现象与社群结构特点去重思中国当代年轻人生活中的社会生态与精神价值^[8]。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小城镇的家庭群体是“小城镇问题”里构成复杂且依旧尚在延展的问题域。受制于传统家庭观念、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因素,小城镇家庭在发展规划、家庭生产与消费状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时代差异,这将持续影响小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与社会交往。

关于中国观众观影现状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为每年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的解读与研究,二为电影观众研究。从近五年的全国院线市场来看,我国电影票房依旧领跑全球,

全国影院总数与银幕数量呈现持续递增的态势,其中以三四线城市为主,观众覆盖面与影院建设将持续下沉至县城或乡镇的青年观众^[9],相关信息如表1所示。从区域分布可见,得益于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小城镇影院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乡镇的观影人次稳步提升。尽管一线城市电影观众年观影次数已高达4.2次,但因为“我国一二线城市的影院建设逐渐饱和、同质化竞争加剧”^[10],一线城市票房比率依旧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对此,陈旭光认为,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电影与社会、观众、市场的相互作用日益深化,而“三四线城市所建影院规模较小,银幕数量较少”^[11]的现状将导致城市、小城镇与乡村观众在年龄、性别、观影旨趣与消费行为等方面出现地级差异。在新时代农村电影放映方面,近年来“市场主体积极性、影片放映数量、放映内容不断提高、增加”^[12]。具体到小城镇观众,陶冶认为,“小镇青年与乡镇影院之间是一种互为建构的双向关系”^[13],笔者根据实地调研后认为,“在小城镇,30~39岁区间、月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远多于男性”^[14],且存在“新主流电影在小城镇自发式下沉传播”^[15]的现象。上述基于数据和材料的研究厘清了国内电影市场的现状与趋势,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表1 2018—2023年分级城市观影人次占比

分级观影分布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一线城市	19.3%	19.1%	17.6%	16.7%	14.9%	16.5%
二线城市	47.0%	46.4%	45.4%	44.1%	44.0%	44.5%
三线城市	16.7%	16.9%	17.5%	18.4%	19.7%	18.3%
四线城市	17.0%	17.6%	19.5%	20.8%	21.4%	20.7%

数据来源:灯塔专业版

综上所述,小城镇家庭研究已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关注,随着小城镇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开放,小城镇家庭群体将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重要关注对象。小城镇家庭观影的群体类型与消费习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如今电影产业的内容生产、市场供应、文化效果及其衍生产业。本文旨在描绘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群像特征,探寻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进行文化消费的驱动力,厘清小城镇文化消费领域中的代际互动机制。

三、研究方法

(一) 个案选择

鉴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色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选定湖北省麻城市(县级市)、甘肃省秦安县、贵州省大方县、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以及浙江省瑞安市(县级市)为田野地点,这五个地点分别位于我国的中、西、南、北、东五个方位,本研究确保所选的五个地点均至少配备一家电影院,既分散又全面的地理布局有助于本研究更全面、细致地剖析不同地域背景下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共性与个性。同时,这些田野地点各自代表了五种迥异的电影文化发展状况,从而充分展现电影事业在全国不同地域小城镇所呈现的多样性特征。

麻城市位于湖北省东北部,毗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距离省会武汉市相距约110公里。作为知名的移民文化发源地,麻城市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9.82%,人口流动性较大。在电影文化事业方面,麻城市自1964年起便积极布局电影放映工作,“根据各地人口分布、交通条件设置放映点。划分电影队放映区域、安排场次及收费标准,全县共设置放映点604个”^[16]。时至今日,麻城市已拥有3家现代化电影院。秦安县坐落于甘肃省东南部,人口城镇化率为36.05%。在当地文化政策的扶持

下,秦安县现有现代化电影院1座,同时兼有“乡办电影队20个,村办、个体办电影队共24个,厂办、校办、单位办放映队10个”^[17],为居民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娱选择。大方县隶属于贵州省毕节市下辖县,距离省城贵阳约150公里。大方县人口城镇化率高达50%。在文化建设方面,大方县具有悠久的电影放映历史,早在1931年便已有私有电影院运营记录。大方县现有3家现代化电影院,为民众提供了高品质的观影体验。太仆寺旗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下辖的县级行政单位,人口城镇化率达48.46%。太仆寺旗作为一个以蒙古族为主要民族构成的地区,其群众文化活动长期以乌兰牧骑、说书以及秧歌等传统形式为主,地区观影氛围相对淡薄。为丰富民众文化生活,自2016年起,太仆寺旗成功建成并运营一座电影院。作为浙江省温州市代管的县级市,瑞安市素有全国最具经济实力县城的美誉。该市户籍人口达到125.63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亦高达69%,其城市化进程成果显著。在电影事业方面,瑞安市地方政府大力扶持当地私营电影院的建设和发展,目前该市区及其下辖镇拥有共计14家电影院,在全国县级市同比中数量较多。

(二) 研究过程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小组于2021年6月至10月分别对五地近1350位个案进行了实地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笔者通过在电影院内部及其周边商圈、居民区等人员密集区域的深度考察,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针对全年龄段的居民进行细致观察与面对面沟通。在询问受访者是否有日常或曾经观影的习惯时,对于给予肯定答复的受访者,笔者随即进行匿名调查问卷的发放,并有针对性地与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展开交流。问卷调查与对谈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收集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年龄、学历层次、职业类别、收入水平、常住地点、婚恋情况);二是考察受访者的观影习惯(获知渠道、观影频率、观影方式、票价心理预期、观影原因、候场行为等);三是调查受访者的观影偏好(偏爱的电影类型及其地区、关注元素、观影活动过程)。在剔除漏答、错答严重的废卷后,笔者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307份。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如若获悉受访者现正进行或曾经有过家庭集体观影经历,笔者会在尊重并征得受访者明确同意的基础上开展深度访谈。访谈采取非结构方式,即笔者将对问卷中有关家庭观影之选项进行追问,以获取受访者对于家庭观影的真实看法、动机等更为详尽的信息。经过严格筛选,笔者共对131组具有家庭观影经历的受访者进行了15~90分钟不等的面对面访谈,获取了丰富的问卷数据及相关访谈信息。受访者的访谈录音及受访者完成的调查问卷都充分展现了他们进行家庭观影时的经历、感受以及对家庭观影的看法。而在受访者的选择上,本研究选择以电影院候场区域的青年群体为主要调研对象,同时为确保年龄层次的完整性,调研范围覆盖了从10岁至62岁的不同年龄群体,力求保证受访者年龄、性别以及地区分布的全面性。与此同时,本次调研还特别邀请了三个不同地区的5位影院经理进行深度访谈。影院经理从影院运营的视角出发,对其影院的消费群体进行了剖析,又结合自身的运营经验,与笔者分享了该影院为家庭观影群体所做出的服务调整举措。目前,以上所有数据材料已全部完成录音和转录工作,这些宝贵的行业见解与一手资料,将为后续的研究分析提供佐证。

经过筛选,本文的最终样本选定为五地的26位受访者,受访者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受访者基本信息

序号	性别	年龄	职业类别	常住城市	样本特征
1	女	46岁	家庭妇女	瑞安市	与配偶一同观影
2	女	28岁	事业单位职工	秦安县	在孕期与配偶一同观影
3	男	28岁	金融从业者	常驻武汉,麻城市人	假期返乡,与父母一同观影

续表

序号	性别	年龄	职业类别	常住城市	样本特征
4	男	52岁	国企员工	秦安县	与儿子一同观影
5	男	33岁	影院经理	麻城市	无
6	女	39岁	家庭主妇	秦安县	与配偶、孩子一同观影
7	女	52岁	家庭主妇	麻城市	家族一同观影
8	女	35岁	影院工作人员	麻城市	资深影迷
9	女	15岁	初中生	麻城市	带着10岁的堂妹一同观影
10	男	18岁	高中生	瑞安市	带旁系亲戚一同观影
11	女	15岁	初中生	瑞安市	带旁系亲戚一同观影
12	女	29岁	超市员工	麻城市	只与孩子一同观看影片
13	男	48岁	出租车司机	瑞安市	几乎未看过电影,但其妻儿都是资深影迷
14	男	14岁	初中生	麻城市	周末常与家人一同观影
15	女	32岁	自由职业者	瑞安市	与家人一同观影的频率不高
16	男	62岁	退休人员	麻城市	在电影院候场大厅等待家人
17	女	33岁	咖啡店老板	瑞安市	仅在陪伴儿子时才会观影
18	女	35岁	小学教师	秦安县	常与儿子、友人一同观影
19	男	15岁	高中生	大方县	与朋友观影为主
20	男	18岁	高中生	瑞安市	与爷爷一同观影
21	男	14岁	初中生	麻城市	与父母一同观影
22	男	37岁	商人	瑞安市	与家人在瑞安市下辖镇一同观影
23	男	17岁	自由职业者	秦安县	只在电影院玩电子游戏设施
24	女	15岁	初中生	太仆寺旗	与朋友一起在影院休息聊天
25	女	31岁	其他职业	麻城市	几个家庭相约一同观影
26	女	20岁	大学生	瑞安市	与父母一同观影

四、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人物画像

本次调研的问卷数据显示,小城镇居民曾因“为了与家人一起休闲娱乐”而选择前往影院观影的比例占全部受访者的51.3%,有56.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主要通过朋友或家人的推荐来获取电影信息或购买电影票。这些数据表明,家庭因素是小城镇电影受众发生观影行为的重要动机,家庭群体有望成为当地电影票房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

尽管因地域差异,五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划布局以及国家政策辐射力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调研结果显示,五地家庭观影群体在年龄结构、收入水平以及参与家庭观影的人员数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这一发现说明,外部环境的差异对家庭观影群体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对五地131组个案的群体观影现象进行数据比对,如图1所示显示,核心家庭集体观影或已成为当代小城镇家庭观影的主流形式。在参与家庭观影的人员构成方面,35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占据了显著比例,而学生与家庭妇女等中低收入者及无收入者群体构成了家庭观影的主力军,这些发现充分彰显了“小镇青年”在小城镇文化消费领域的核心消费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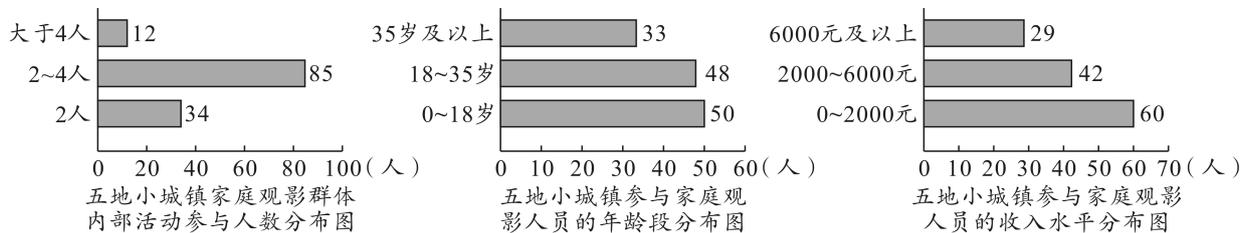


图1 五地小城镇参与家庭观影人员的数量、年龄段与收入水平

五、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类型特征

近十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小城镇在文化环境与审美主体方面均发生了显著更迭,上一代“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变”^[18]在家庭的文化行为中得以全面展现。调研发现,以亲属及拟亲属关系为核心的观影群体已成为小城镇电影受众的重要构成。家庭成员们通过共同观影来增进彼此的情感联结与共时经验,群体观影逐渐成为增强家庭互动的文化联结。本文抽样选取了五地深度访谈中的典型个案,对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类型特征进行归纳分析,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样态差异反映了小城镇社会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转变。

(一) 聚合型家庭观影群体

聚合型家庭观影群体主要由核心家庭成员构成,小城镇家庭两代人共同观影的行为呈现出集群化、协商化的特质。这与阎云翔研究所揭示的现象基本吻合,即“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总趋势是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化”^[19]。核心家庭通常包含已婚夫妇脱离氏族生活后的家庭形态,以及年轻父母与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结构,其中子女的抚育工作已逐渐演变为当代中国核心家庭的生活重心。鉴于夫妻与亲子关系的相互性,核心家庭的“生物联系成了感情联系和社会联系的基础”^[20],核心家庭的年轻化趋势使得情感联络与子女教化等因素在小城镇家庭观影动机中占据重要地位。

1. 夫妻核心家庭群体

在本次调研受访的样本中,夫妻核心家庭进行观影仅占5例,其中又仅有两例为已婚已孕的夫妻。在这两例中,一例因公司发放观影卡而偶然参与,呈现出较强的随机性;另一例则把夫妻共同观影视作增进婚姻和谐、缓解子女不在身边时无聊生活的有效途径。“好不容易有节假日,女儿假期回不了家,我们正好出来看看电影,毕竟平时也忙,来休息一下也好。”(受访者1)对已婚未孕的夫妻观影群体而言,夫妻结伴观影是恋爱感的延续。“我们年轻谈恋爱时看(电影)比较多,现在(孩子)快生了我都已经不怎么想这个了。生孩子就是一个坎,生完孩子我们应该不会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了。”(受访者2)大多数核心家庭在生育子女后,会逐渐把观影方式从影院转移至手机直播、网络电视等线上平台。在小城镇,婚姻与生育的进度紧密关联,“在这里,大家都会默认结了婚就要赶紧要孩子,家里会催年轻人快生,小城镇的婚姻没有过渡期。”(受访者3)相较于大城市,这种现象显然是受到乡土社会伦理经验秩序的影响与制约。在社会性抚育的压力下,夫妻间以爱情为基础的感情纽带逐渐减弱,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生活关联和情感联系会从两性之间过渡至具有先天血缘联结的亲子关系,进而影响着夫妻间的情感交流与文化互动。曾经为年轻情侣提供独处空间与培养亲密关系的共同观影行为也随之成为小城镇居民口中“年轻人才干的事”或“年轻人不在,我们才赶时髦做的事”。

2. 标准核心家庭群体

标准核心家庭是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主力军,其稳定的家庭模式主要以夫、妻与孩子“铁三角”组成,通常以内部协商的方式契合出成员在影院集体观影的惯习。鉴于小城镇核心家庭前往影

院观影需要较高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此类集体观影活动多集中于春节、寒暑假等特定时间,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重要的观影时段“占据着小城镇影院的80%及以上的票房份额”(受访者4)。

在小城镇家庭的文化活动中,年轻一代逐渐获得更多参与权和决策权,包括影片选择权及其他衍生消费决策权。年轻父母也乐于把集体观影视为一种家庭聚会形式,“我儿子平时在外地读书很少回家,他喜欢看电影,所以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会一家子去看场电影,自己就几乎不看。”(受访者5)同时,部分家长也将家庭集体观影行为视为对孩子的一种奖励机制,旨在激励孩子在学习或其他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在访谈中,多名学生表示,他/她们曾因学业成绩优异而获得与父母共同观看电影的奖励。对于家长而言,“一家人看电影挺贵的,至少也要上百块。而且(我们)还需要花几个小时在影院,挺耽误学习的。所以不是她表现好我们都不去。”(受访者6)当笔者向这位受访者询问其孩子是否愿意参与家庭观影活动时,孩子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和期待。对此,该女士随即提出,孩子先完成暑假作业是家庭集体观影的先决条件。可见,在权衡家庭集体观影所需的资金与时间投入时,父母通常会重点考虑孩子的观影期望与实际表现,并通过达成代际间的条件交换来协调、实现家庭集体观影活动。核心家庭的影院观影行为为两代人之间提供了条件交换与集体活动的契机,进一步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与文化互动。

(二) 扩大型亲属观影群体

在前述核心家庭共同观影的案例中,核心家庭观影者的访谈显示出当下小城镇人口外流、迁移率上升以及核心家庭成员缺位的现实处境,小城镇的人口流动导致部分家庭面临去传统、去核心化,家庭观影转变为次级亲属群体间的文化互动。当传统血缘、亲缘构成的核心家庭难以满足小城镇居民的经济需要与文化需求时,以地缘、利缘与趣缘为纽带的扩大型亲属关系逐渐成为小城镇氏族圈层间,实现生活互助与社会资源协调的关键力量。

作为小城镇中“非正式的社会、经济联合的一种重要形式”^[21],扩大型亲属关系在现代家庭结构中主要由氏族内跨代家庭成员与旁系亲属构成,他们一同前往影院观影,以此促进氏族间的生活交融和社交渗透。然而,血缘关系的疏远、社会身份的隔阂以及人际交往的弱关联性,促使扩大型亲属观影群体的集体活动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方面,跨代直系长辈对孙辈的无条件迁就愈发明显;另一方面,旁系同辈亲属间则更多基于平等交换的原则提供工具性支持。这两种现象共同反映了在小城镇社会变迁中扩大型亲属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1. 跨代亲属共同观影

跨代亲属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双方相互提供生活资源和社会资本,跨代亲属间的血缘联系表现出无条件屈就的特点。由于代际亲属间文化趣味的差异,跨代家庭观影群体的案例占比较低,其中大部分的跨代亲属间的观影互动更像是长辈权衡或妥协后作出的折衷选择。“(我)平时从来不看电影,如果不是公司的工会给了全家人的票,儿子孙子都想来,我根本就不会进影院。”(受访者7)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例特殊的跨代影迷家庭。“我们家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看电影了。刚开始在广场上看流动放映,后来有了影院就一起去影院看。我丈夫和女儿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们家一有票就会一起看电影,这也是我产后选择在电影院工作的原因。”(受访者8)该样本证明,尽管代际间存在文化差异,但地缘的亲近性以及长辈对年轻一辈的包容与妥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爱好,“我父母60多岁,他们还陪我们一起去看了《速度与激情9》。小城镇生活的好处就是家人约在一起很方便,这是我去上海没法比的。”(受访者8)

小城镇的乡土性与直系血缘的高度缔联性为部分跨代家庭的代际互动和审美交汇提供了充分条件,在此前提下,祖孙三代间的认知与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调和与包容。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家庭亲密关系转向和父权伦理衰落对跨代关系的观影和谐度等方面提出诸多挑战,长辈需具备更强的调节适应能力以及文化兼容能力才能较好应对。

2. 旁系亲属集体观影

扩大型小城镇家庭群体观影的另一个显著现象是,氏族内旁系亲属因地缘环境的相近性而选择共同观影。这种家庭文化活动不仅强化了原本就深厚的家族渊源和亲情纽带,更使得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间的交往与互动变得更为频繁和密切,这令家族成员间形成了独特而紧密的社交网络,并营造出富有现代气息的文化氛围。

在现代小城镇,一种具有社会交换功能和拟态性质的旁系亲属集体观影现象正逐渐受到青睐。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旁系亲属共同观影不仅满足了个体文化娱乐的生活需求,也为亲属间增进感情提供了有效的互动方式。譬如,麻城市存在大量旁系亲戚或亲密友人间共同观影的现象,出于日常互助互惠的目的,他们选择共同观影作为增进感情和共享文化体验的方式。“我和妹妹的老公都长期在外,如果父母不能帮忙照顾,我俩就轮着带两家小孩去看电影。”(受访者8)这种旁系亲友共同观影的文化活动还在子代间得到了延续,从而形成旁系同辈亲属间的观影习惯和亲情纽带,“父母有事,所以我经常带我亲妹和堂妹来看电影。”(受访者9)自二胎政策开放以来,麻城市幼儿数量激增与城镇劳动人口外流的现象日趋明显。由于育儿成本提高,许多年轻父母选择外出工作,这导致核心家庭从单纯的双系抚育扩大为具有社会资本关联性的多系抚育,共同的生活环境与社会抚育经历使得该地居民逐渐形成了旁系亲友相互帮扶、社会资本与亲缘相联合的互利互惠习惯。因此,他们的观影行为往往具有强目的性与功能性。

除了亲缘关联与社交属性,旁系亲友共同观影还具有一定的拟态性质。小城镇生活节奏相对较慢,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亲属们更趋向于寻求一种类似于共享家族生活的观影体验。共同观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模拟过去的家族生活,使成员感受到亲情温暖。由于五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生活习惯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类观影群体的行为样态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在经济不太发达、乡土性更浓厚的太仆寺旗、秦安县与大方县,旁系亲友间共同观影的行为不多见,而在经济发展较好、现代性明显的瑞安市,该市不仅拥有数量更多的电影院,其居民也更倾向于将影院观影作为一种日常娱乐方式和家庭活动日程。在瑞安市,旁系亲属亲友间相约观影的行为具有明显的随机性与拟态性。“我是跟我堂弟表妹一同观影的。今天家里聚会,长辈们都在打麻将,还抽烟,我们就来影院找部电影来避一下。”(受访者10)年轻旁支亲属逐渐远离传统式的家族聚会,转而在现代娱乐活动中寻求快乐。“最经常陪我去看电影的就是小姨和堂妹了。大人的聚会我们都好无聊,还是我们几个一起来看电影有意思。”(受访者11)瑞安市丰富的观影资源与较为富裕的经济条件使扩大型亲属观影在观影目的、时间及电影类型更具可选择性,也令整个观影互动过程更具拟态化与年轻化。

总体来说,扩大型小城镇家庭群体中旁系亲属相约共同观影的现象,既体现了地缘环境和家族渊源对亲属间交往互动的促进作用,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亲属关系和文化活动的新变化,影院为小城镇亲属群体提供了增进感情、实现社会交换和拟态体验的平台。

(三) 分散型家庭观影群体

由于小城镇家庭结构的差异、社会分工的区别以及收入与消费的不平衡现象,许多小城镇居民选择前往城市长期务工。这一流动趋势势必导致外出者在家庭日常事务、子女教育及家庭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度显著降低,进而对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产生影响。由于外出者家庭参与度及情感联系的减弱,其在家庭文化活动和重大事务中的话语权受到明显缩减。同时,伴随着年轻一代主体意识的逐步提升,现代小城镇家庭的权力中心正由传统的父辈向子辈转移。子辈的情感需求与日益增强的个体意识驱使他们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文化旨趣的满足以及对家庭决策的更多参与。这些因素共同成为塑造小城镇家庭权力结构与组织形态的重要力量。现在,中国小城镇家庭结构正由传统的社会秩序结构向个人领域转变,这使得部分小城镇家庭及亲属群体呈现出一种观影新趋势,即家庭成员倾向于在观影过程中暂时脱离家庭角色,以个体或部分家庭成员的身份独立进行观影活动,这种非

传统的家庭观影模式逐渐成为当代小城镇家庭观影的主流样态之一。

1. 核心家庭局部观影

鉴于外出者在核心家庭中的低家庭活动参与度,传统的家长制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成员间在文化生活方面逐渐相互理解与尊重,小城镇家庭的文化接受行为正在发生悄然变革。在观影习惯方面,一种新型的局部成员间协同观影的方式正悄然兴起,家庭部分成员选择共同参与观影活动,年轻一代的审美旨趣和情感需求得到尊重甚至迁就。“我(以前)在上海打工时会跟我老公经常看(电影)。但他现在长期在外打工,我就很少看电影了。如果要看,我也是带着我儿子看看动画片,现在主要是陪孩子看,他很喜欢看电影。”(受访者 12)核心家庭内部形成了可供部分成员文化交流与情感慰藉的次生型观影群体,这种文化隔离造成外出者成为局部观影群体中缺席的他者。这种文化身份的转变不仅反映了家庭内部权力机制的调整,也暴露了家庭内部存在的文化隔阂和认知分歧,“我老婆经常带着孩子去看,但我平时跑出租车养家也忙得很。我们亲戚经常送我们电影票,但(我)休息时也不太想去专门跑去看电影。如果休息,我在家里做顿饭就挺好,电影票留给我,我也不会去看。”(受访者 13)缺席者心存无奈,但由于无法融入观影情境,他们在家庭观影活动中逐渐沦为“陪衬”角色。

2. 家庭成员分开观影

分散型家庭观影的另一现象是家庭成员共同往返影院,但选择观看不同的电影,在五地调研中,这类观影现象不下 10 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间审美旨趣的差异,这反映出家庭内部成员对于观影体验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需求。“我爸爸喜欢看悬疑片,我妈喜欢看轻松点的电影,然后我最喜欢看动画和动漫电影。平时如果(我们)都有想看的电影,我们就选差不多时间的场次,大家一起去,分开看然后各自回来;如果大家要看电影,那就选搞笑的电影。”(受访者 14)“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喜好,我没必要非要迁就她(女儿)。”(受访者 15)正如阎云翔所言,“个人具有的情感和欲望以及对于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8],家庭成员分开观影的行为体现了文化审美的个体脱嵌现象,印证着小城镇中个体主义在家庭文化观念中的崛起。尽管如此,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影需求依旧是以家庭成员共同往返影院为前提。家庭成员结伴出行是小城镇家庭观影的底色,审美趣味的差异与文化行为现代性身份流动过程共同赋予该观影群体丰富的“身份建构和生活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多元化”^[22]。这种分散型家庭观影方式成为小城镇家庭一种新的文化接受形式,这也是“80 后”小镇青年组建的年轻家庭面临代际文化冲突时,自发形成的一种兼具个性包容与血缘趋同的代际自治行为。

3. 长辈接送子辈观影

鉴于生活消费习惯与艺术审美观念的差异性,家庭观影群体中的代际审美分化现象日益凸显,其中“年轻人观影,长辈在外等候”的现象亦值得被关注。在本次调研中,这类现象合计出现 13 例。在等待观影散场之际,麻城市有位正在等候的长辈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观看《少林寺》时的感受,在解释自己为何不入场观看电影时,他先是归因于“没有想看的电影”,最后袒露“现在一张电影票挺贵的,他们(儿子和孙女)看就可以了”(受访者 16)。这反映出在家庭集体观影活动中,中老年家庭成员常处于“不在场的在场”这一特殊游离状态。尹杭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有近 90% 的受访老年人去影院观影的频率非常低,超过半年一次;其中更是有 75.32% (174 人)几乎不去影院观影”^[23]。鉴于当前电影的创作内容愈发迎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由于认知老化及身体机能的衰退,第一代中老年观影群体对影院观影的期待值骤降。他(她)们在电影市场消费中越来越处于边缘化、异质化的地位,倾向于牺牲自身的观影权力来填补儿女们日益增长的观影需求与代际审美之间的差异,并尽量通过不需要经济支出的集体活动来维护代际关系的和谐。

综上所述,五地小城镇家庭观影现象呈现出总体趋同、局部差异的样态。各地家庭观影生活的

总体样态与家庭互动频率、居所聚散状况以及家庭分工模式等因素密切相关。作为影响家庭观影生活的核心要素,这些因素又进一步与家庭内部的情感交流、思维方式和家庭结构等形成因果关联。同时,五地小城镇的家庭观影群体在电影接受程度和具体观影行为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这主要受到人口流动比率、审美认知差异、消费能力以及心态倾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于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形成了多样化的集体观影样态,并产生了独特的代际互动机制。

六、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互动机制

作为一个因血缘、亲缘和地缘而结构起来的社会聚落,中国小城镇家庭并不具备文化和情感的自然趋同性。学 Barbalet 指出,“中国家庭关系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即便在缺乏直接回报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依然愿意提供支持”^[5]。无论代际之间存在怎样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区隔,小城镇亲属关系的亲密性依旧使他(她)们在日常集体生活中展现出不计得失的伦理责任感,屈就年轻一代的文化偏好。与此同时,年轻一代也开始实行“文化反哺”,负起照顾长辈的责任。由此,观影这一日常的娱乐文化实践反映出小城镇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家庭权力流动,集体观影不仅是家庭成员对代际间良性互动的深切期待,也是个体默认的权力让渡,长幼相辅的代际互动现象蕴含着氏族伦理与个体主义在文化实践中的共存与融合。

(一) 观影互动过程:亲属意愿协商与文化权力让渡

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的整体样态反映出,日常生活中亲属关系联结与家庭权力让渡的复杂过程。出现观影意向的个体差异或代际冲突时,家庭观影群体需要协商互动,以此达成共识,实现目标兼容与情感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具有共同前往影院观影的文化行为意愿,其背后实质是对“家和万事兴”等传统家庭观念的维护与坚守,集体观影的互动商榷过程亦是小城镇父辈与子辈之间文化权力让渡与家庭结构变迁的生动体现。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五地不同的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拥有高度一致的观影互动过程:一个家庭会以某位家庭成员的观影趣味为中心展开选片与观影时间的协商讨论,随后由一人负责网络购票,之后家庭成员共同前往影院,他们或进行场外娱乐消费,或在场内陪伴家人等待,最终家庭成员齐聚共同观影并一同返家。这一系列的互动行为,不仅展现了家庭成员间的亲密与和谐,也反映了小城镇家庭生活文化生活的鲜活面貌。

在家庭集体观影活动中,家庭成员置身于高度协同的互动情境之中,代际间相互妥协、文化权力让渡以及陪同观影便成了家庭责任的重要体现。正如戈夫曼所言,“作为一种惯例化的沟通手段,个体通过它们展示自己的特征,或向情境中的其他参与者表达赞赏之情”^[24],只有各家庭成员把相互迁就和认可的共识融入家庭生活中,代际间的文化权力才能顺利实现交互与让渡。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家庭集体观影的选片权力正逐步转移至年轻一代,年轻人在家庭选片的过程中拥有主导权。“离婚后我儿子跟他爸留在外地,假期好不容易能跟我儿子一块看电影,那当然是他想看什么我都可以,(我)主要是为了陪他,享受亲子时光。”(受访者 17)

然而,小城镇的年轻父母并不是无限制地迁就与妥协于子女的选择。“我认为好电影的标准是它是有教育意义和对社会有益的,孩子们看了要有启发,不然我不会带他去看的。”(受访者 18)为了强化电影对孩子的教化效果,这位母亲会事先对孩子选择的电影进行了解,吸纳子女的喜好,然后作出最终决策。她进一步解释道:“我孩子就是喜欢看动画片,其他都不看。现在挺多动画片也很有教育意义,我一般会听他的意见和评价,感觉不错就去看。”(受访者 18)在小城镇家庭的娱乐文化消费中,父母在选片中的权衡利弊往往夹杂着对子女成才的功利性考量。同时出于对子女的爱护,父母辈大多选择以父权弱化与资源下行的形式部分下放其文化权力,以此完成家庭内部的审美文化排异,维护亲密关系与代际团结。共同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驱使家庭成员在现代文化生活中“构建

出一个小范围‘世界’,利用以利益、兴趣、价值和情感作为延伸形成特定的链接关系”^[25],并最终通过观影实现信息、资源与情感的交叠与传递。

在新型家庭结构中,子代对父辈的“文化反哺”现象,即子辈迁就父辈的观影喜好在小城镇家庭观影活动中逐渐显现。调查表明,这种文化反哺式的观影行为多局限于直系亲属间,且频率相对较低,尚未能成为如秦安县、太仆寺旗与大方县等小城镇家庭的日常生活习惯。街头闲谈与广场漫步依然是三地居民的主要消遣方式,“一般都是我跟朋友或我和爸妈一起来看。我们这边少有一堆人来看电影的,还不如坐在街边唠嗑。”(受访者 19)但在麻城市与瑞安市,部分年轻一代开始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并乐于成为陪同观影的迁就方。这种子辈对家人的体谅和顾及,在父辈眼中被视为子代孝敬长辈的体现,他们往往会将此作为佳话,反复向他人述说,以彰显自己家族的和谐与亲情的浓厚。“今天家庭聚会,我姥爷看电视时随口说他没来过影院,我觉得我今天就带他来看个电影,就看他喜欢的主旋律战争片,让他感受一下电影院氛围。”(受访者 20)许多家庭的年轻一代在集体观影时会主动出让选片权,迁就长辈的喜好。“我爸爸喜欢看悬疑片,我平时看动画和动漫电影比较多。但一家人一起看的话,我们都会选择我妈妈喜欢看的喜剧片。”(受访者 21)子女的选片迁就与陪同观影行为,俨然成为小城镇家庭维护和谐关系的新趋势,这表明,小城镇的家庭观影协商讨论过程已然不再是“下行式家庭主义”^[26],而是家庭成员在特定观影情境内进行的文化观念整合与情感关系维护。

小城镇家庭在观影活动中的协商过程,实质上是家庭成员间相互尊重并适应对方审美趣味的互动行为,其目的在于增强家庭成员间的共时感知,促进情感交融。可见,通过陪同观影和让渡选片权所实现的家庭观影协商互动,是家庭成员以传统家庭观念为基石,对代际间文化差异进行的积极调和。这种以权力让渡与“文化反哺”为策略的代际互动行为,不仅促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文化交流和双向突破,还在观影情境中成功地将家庭内部的差异向心融合,以此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凝聚力。

(二) 观影互动仪式:空间场域、情感关联与契约缔结

作为汇聚家庭成员的文化旨趣与文化权力的渠道,小城镇家庭观影的互动过程旨在调和娱乐消费品位、策划共同观影事件,并建构集体文化记忆。具体来说,家庭成员共同商议观看的影片与相关活动事宜,成员间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权力在观影互动中变得趋近,家族满怀期待地一同前往电影院,并在观影厅中共享观影体验。在观影过程中,家庭成员的文化互动“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出人类理性所必需的情感体验及其相对应的理念”^[27]。

首先,小城镇家庭观影互动仪式主要在小城镇电影院这一特定空间场域内展开,电影院与家庭成员共同构筑了独特的仪式时空与仪式对象。戈夫曼认为,成功建构互动仪式情境的关键要素包括“物理空间;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共同在场并由此引发监控性;偶然性、即时性”^[24],影院正是建构互动仪式的绝佳空间。作为小城镇文娱活动的重要载体,小城镇电影院大多坐落于当地商业综合体或居民社区的核心地带,其功能不局限于电影放映,还具备游戏厅、餐吧等,是具有综合性功能的社会空间。小城镇电影院通常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精心安排的商业布局,青少年即便没有观影计划,也依旧会前往进行娱乐消遣,独自休憩,或与友人相聚。“我不喜欢电影,我来电影院不为看电影,而是我们这电影院门口的游戏厅划算又好玩。现在我们都习惯了这种休闲方式,所以在过年期间,我偶尔也会和朋友与家人看场电影。”(受访者 23)“电影院的空调不用花钱,我们周末都会来这里,一边喝奶茶一边休息,看看预告片,有喜欢的就存点钱看。”(受访者 24)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电影院既是提供娱乐的空间场所,也是承载文化记忆的场域,不仅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记忆,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在观影过程中,观影厅的昏暗环境削弱了空间的现实感,独立的座位设置将家庭成员隔离开来,使他们得以暂时摆脱原有的社会角色,共同经历观影过程。这种富有个体性的集体经历塑造了家庭成员的影像记忆,使得集体观影成为具有“仪式感”的小城镇家庭

活动。

其次,家庭情感联结是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进行代际互动的核心动力。在小城镇日常生活中,现代个人主义观念与传统家庭观念并存,许多家庭不再满足于传统乡土社会强调的伦理规约,开始重视家庭成员彼此间的观念相通与情感共鸣。“电影好不好看对我而言都无所谓,主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干个啥,完后还能一起聊聊。”(受访者22)这例样本证明,小城镇家庭集体观影不仅有助于强化家庭情感依赖,还能提升家庭关系的稳定性。

在家庭观影互动仪式里,成员的情感投入程度与群体效应对于构建情感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家庭成员通过让渡选片权及牺牲个人休闲时间来陪同家人进行集体观影,这往往需要他们在观影情境中维持认知与情感的双重投入,并及时对其他家庭成员给予反应与应和。同时,观影厅的昏暗环境与隔离特性要求家庭观影群体在“卷入的同时需要对当下仪式维持认知与情感上的运作共识”^[28]。可见,家庭成员投入的关照与移情是家庭完成观影互动仪式的关键所在。“我刚中考毕业,所以这个暑假才会有时间跟家里人看电影,平时的机会太少了,爸妈会让我挑最喜欢的片子(去看),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受访者14)观影互动过程中的协商与契合使家庭成员在集体活动中感受到被疗愈与被满足的深刻体验,相互理解与协作为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搭建了桥梁,促进了家庭的和谐与融洽,强化了家庭成员在观影仪式秩序中的情感归属感。

再次,缔结契约是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进行代际互动的保证。小城镇家庭观影互动仪式往往建立在成员的共识上,并且需要家庭成员默契地让渡权力、明确各自职责,从而促成代际审美与认知观念的逐步趋同。“我经常跟妹妹两家人约在一起吃个饭喝个奶茶,再一起带小孩做手工和看电影。我们姐妹们聊得开心,小孩也不至于没人照看。有时候大家忙,一个家长会带几家的小孩去玩或者看电影,我再给她买点礼物或者给点钱作为回礼。”(受访者8)观影互动仪式的规约并不需要经过严肃的商议,而是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这种默契建立在长时间地相互了解、沟通与磨合的基础上。小城镇家庭观影仪式的约定往往通过简短的线上或线下沟通完成,形成家庭成员间的默认契约。“和家人一起看电影基本就是‘说走就走’,这跟朋友同学还是不同的,在讨论上会更轻松些。”(受访者26)家庭成员对于这类口头契约的履行,有助于增进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促进良好的沟通机制形成。

在小城镇电影院里,家庭观影互动仪式组成了巨大的传播网络,这种代际互动不仅生动展现了小城镇家庭生活文化的多维面貌,也体现了家庭成员“以‘附近’为中心来认识世界”^[29]的观察方式。在参与家庭观影仪式时,家庭成员共同建立的互动秩序及其被组织化的过程是小城镇“维持着传统家庭伦理规范又满足现代年轻人权力和自我实现的需要”^[30],也是小城镇家庭在文化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一种实践性策略。小城镇家庭以代际文化互动来对抗传统乡土性与现代性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冲击与生活焦虑,既维系了传统家庭伦理规范,又满足了现代年轻人对家庭权力与自我实现的追求。小城镇家庭共有一段段可供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集体记忆,从而在共享的情感记忆中建构出家庭团结一致的生活愿景,小城镇家庭观影行为增强了家庭的内部稳定性与认知可预期性。

七、结论

家庭观影是当下小城镇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群体的代际文化互动已然成为小城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对研究样本中的调查问卷与访谈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尽管本文所选的五个样本区域在文化地理信息层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然而五地的家庭观影群体却展现出三种相似的样态特征,即聚合型、扩大型与分散型。这些特征不仅揭示了小城镇家庭观影结构的内在特点,也凸显了家庭成员在文化消费、代际审美等方面的差异,以及面对这些差异时所采取的不同反应与态度。小城镇家庭观影群体以意愿协商与权力互让的方式,契合出观影活动的具体流程。同时,他

们会在观影情境中灵活调整各自的观影趣味,共同商议观影事宜,进而构筑出一种观影互动仪式。这种仪式不仅体现了小城镇观影家庭在调和代际差异、促进家庭成员间情感共融方面的积极努力,更有助于他们在小城镇电影院这一固定的、承载着“记忆之场”作用的物理空间中形成共时文化记忆,完成各成员对家庭契约的履行与兑现。这种代际互动充分体现了小城镇亲属之间的情感联结与信任缔结,也反映出家庭成员在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重构“稳定”的尝试。可以说,小城镇家庭观影行为是小城镇家庭应对现代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文化策略。

小城镇家庭家庭观影群体的代际文化互动强调事前的协商沟通、观影过程中对家庭契约的自动履行与理想化家庭观影仪式的积极形塑,以此确保家庭各成员在集体观影过程中能够自发地展开平等协商与权力让渡,从而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文化氛围。相较于邻里间的聊天打牌、庙会集聚等传统家庭活动,这种长幼相辅的代际文化互动无疑更具备鲜明的现代性特质。作为一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文化互动实践,小城镇家庭群体以日常生活为载体,实现个体自我实现与集体惯习传承之间的平衡与调和。小城镇家庭观影行为的复杂性表明,家庭成员努力弥合传统乡土性与现代个体性之间的裂痕,以期塑造出“中国家庭的个体化进程中的自我主义和灵活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31]。事实上,小城镇家庭正以自我修正与反复调试的方式应对现代社会转型带给乡土氏族关系及传统生活方式的剧变与挑战。家庭的集体观影行为不仅加深了由不同代际构成的家庭情感联结,也使得小城镇的宏大社会变迁显影于微观具体的文化实践中。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49.
- [2] 孟君,周雯. 考察点、时空体与坐标系:论中国电影中的小城镇. 学习与探索,2018,4:162-168.
- [3] 费孝通. 论小城镇及其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50.
- [4] 国家电影局. 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2018-12-11. [2019-09-25] https://www.chinafilm.gov.cn/xxgk/zcfg/gfxwj/dyxfyjck/201909/t20190925_1509.html.
- [5] J. Barbalet. Tripartite Guanxi: Resolving Kin and Non-kin Discontinuities in Chinese Connections. *Theory and Society*, 2021, 50(1):151-173.
- [6] 郭于华. 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 *社会学研究*, 1994, 6:49-58.
- [7]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4.
- [8] 项飙,康岚.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下). *当代青年研究*, 2023, 6:1-10.
- [9] 刘汉文,陆佳佳. 2022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 *当代电影*, 2023, 2:15-25.
- [10] 张璐. 众声喧哗:近年中国文艺评论热点透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4.
- [11] 陈旭光. “受众为王”时代的电影新变观察. *当代电影*, 2015, 12:4-11.
- [12] 黄立玮. 新时代农村电影公共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成就、挑战与应对. *编辑之友*, 2023, 3:31-36.
- [13] 陶冶. 探寻真实的“小镇青年”——基于华南三个乡镇影院用户的调研. *当代电影*, 2023, 11:56-65.
- [14] 孟君,刘安琦. 人物画像与观影影响因素分析——关于中国小城镇女性电影观众的一项实证研究.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3, 4:59-69.
- [15] 郭雪瑶,孟君. 趣味、心理与渠道:新主流电影小城镇传播的影响因素解码. *电影评介*, 2022, 8:7-12.
- [16] 湖北省麻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麻城县志.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487.
- [17] 秦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秦安县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919.
- [18]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龚晓夏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39;240.
- [19] 康岚. 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代差视角. *中国青年研究*, 2009, 3:68-71+75.
- [20] 费孝通. 生育制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1.

- [21] 张骊.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61.
- [22]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陆洋,黄珍,梁文静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43.
- [23] 尹杭. 老年群体观影情况调研报告. 当代电影,2018,9:143-147.
- [24] 王晴锋. 欧文·戈夫曼与情境互动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91;48.
- [25] 赵寰,侯清鹏. 融合与反哺:B站破圈的后喻文化解读.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6:45-53.
- [26] 阎云翔,杨雯琦. 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探索与争鸣,2017,7:4-15+1.
- [27] A. R. Warfield. Epistemology and Practice:Durkheim's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4.
- [28] E.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Anchor,1959:58.
- [29] 项飙,张子约. 作为视域的“附近”清华社会学评论,2022,1:78-98.
- [30] 白淑英,刘欣. 流动的家庭权力:农村代际同住家庭权力的新样态.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5:161-168+213.
- [31] Y. -X. Yan. 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2021:13.

Complementing the Old and the Young: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Interaction among Families in Chinese Small Towns

Meng Jun, Li Chengj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small-town family group's movie-watching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interaction during movie-watching reflects the complex cultural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in small-town famili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small-town social lif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five places, it is found that family movie-watching groups in Chinese small towns have stable and clear portraits, and family movie-watching behaviors of family groups include aggregation, expansion and dispersion. At the same time, family movie-watching in small towns forms a unique cultur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In a specific movie-watching space, family members complete the movie-watching interaction process by means of willingness negotiation and power transfer. And in the spatial field, emotional correlation and contract conclusion jointly construct the movie-watching interaction ceremony.

Key words: Chinese small towns; family groups; movie-watching behavior;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收稿日期:2023-10-24

■作者单位:孟君,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李诚婧,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刘金波